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冰茧庵文史丛稿

缪钺 著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冰茧庵文史丛稿

缪钺 著
缪元朗 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茧庵文史丛稿/缪钺著;缪元朗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17444 - 2

I. ①冰… II. ①缪…②缪…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
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K207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277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冰茧庵文史丛稿

缪钺 著

缪元朗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7444 - 2

2019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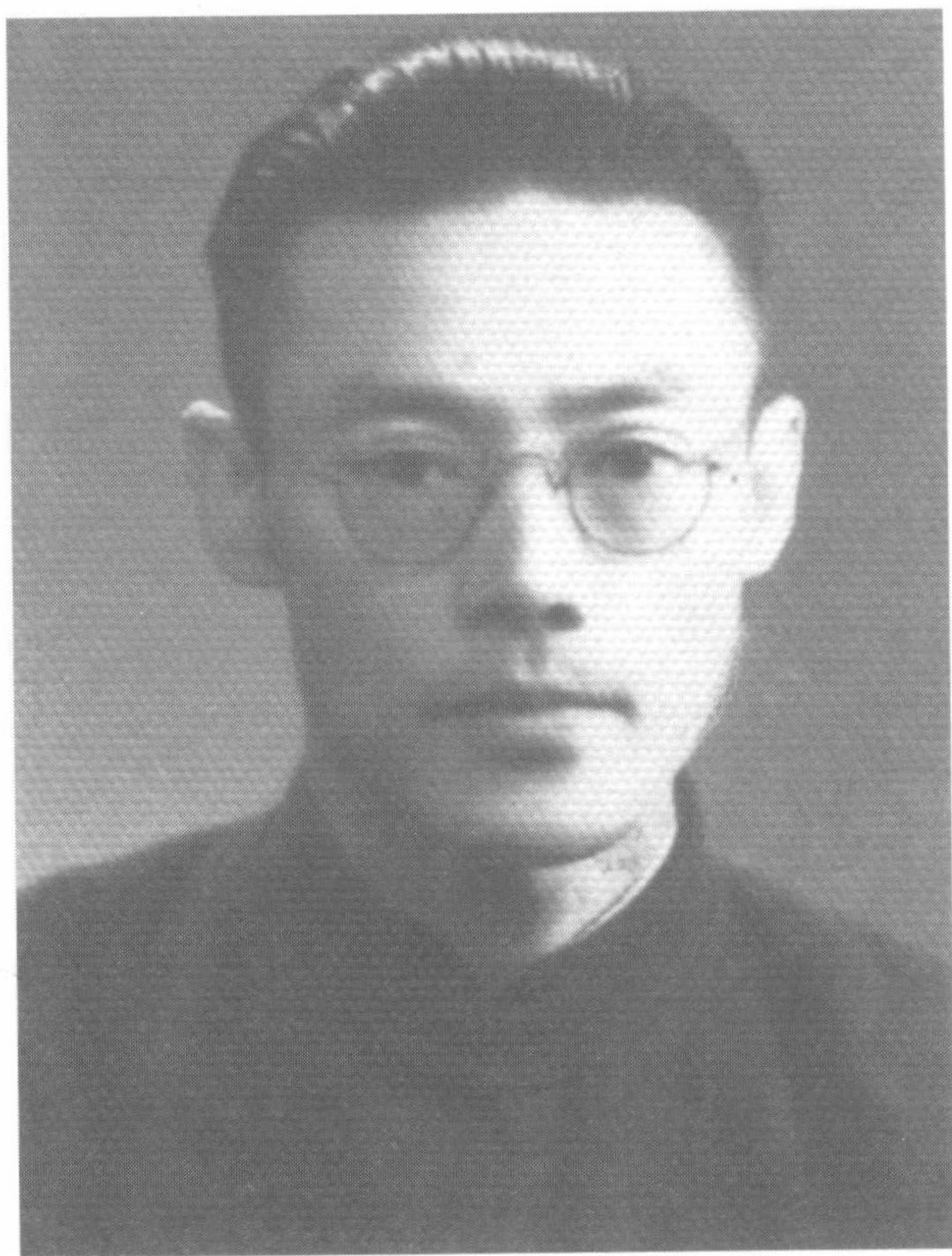
印张 13¼ 插页 2

定价:49.00元



缪 钺

(1904—1995)



中年时期的缪钺先生

念奴嬌

荆篤齡先生嘗示家藏舊硯
拓片刻後蜀花蕊夫人宮詞殘
句手迹徵求題詠賦此報之

摩河池上有冰肌玉骨墮柔顏
色水殿雲房三十六鳳輦龍輿
游歷君主興文后妃行藻朝野
釘娛極金樽檀板花間多少詞
客 我泝江水西來蜀都憑吊千
載空遠迹十四萬人齋解甲空
贖娥眉哀泣朝代興亡春秋更
迭燕子斜陽陌宮詞殘句猶存
才氣橫溢

己巳冬日繆鉞寫於成都



自书《念奴娇》词

出版说明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本馆一大夙愿。自 1897 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有幸首刊了中华现代学术史上诸多开山之著、扛鼎之作；于中华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变迁而言，既为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作为对前人出版成绩与文化理念的承续，本馆倾力谋划，经学界通人擘画，并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终以此丛书呈现于读者面前。唯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并希冀其能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如此宏愿，难免汲深绠短之忧，诚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共襄助之。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0 年 12 月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点,

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目 录

《诗》三百篇纂辑考	1
《吕氏春秋》撰著考	12
陈寿评传	35
清谈与魏晋政治	49
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 附论东晋南朝地方官俸及当时士大夫食量诸问题	78
《文选》赋笺	90
北朝之鲜卑语	110
论词	140
论李义山诗	152
论宋诗	161
论李清照词	175
史达祖评传	192
元遗山年谱汇纂	209
王静安与叔本华	353
评贺麟译斯宾诺莎《致知篇》 ——兼论翻译	365

缪钺先生学术年表	缪元朗	374
存故美,蓄新质 ——缪钺先生《冰茧庵文史丛稿》导读	郑小容	387

《诗》三百篇纂辑考

《诗》三百篇如何编定,《史记·孔子世家》谓: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是说也,唐孔颖达,宋郑樵、朱熹、叶适,清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等,皆疑而辨之。以为《论语》记孔子之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定本,不应指其自删者而言;孔子只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举,至多不过刊定整理。诸家论证详明,无烦重述。孔子删诗之说既未可尽信,然则《诗》三百篇之定本如何纂辑而成, (“诗三百”,乃指成数而言,其确数不可知。汉儒传《诗》三百五篇,孔子所谓“《诗》三百”,是否即此数,亦不可考。)自为一尚待探讨之问题。

《诗》三百篇经秦火之厄,因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少残缺。惟西汉传《诗》者先有齐、鲁、韩三家,《毛诗》晚出,其后《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而《毛诗》独传。三家《诗》篇名章句今犹有可考者,取与《毛诗》对勘,颇有差异。故严格论之,吾人既不能定此四家之本,孰为得孔氏真传,更不能执今《毛诗》以为即孔子所读之本。《论语》记孔子引《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罕》)今《毛诗》中无之。子夏引《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八佾》)今《毛诗》无末一句。此皆孔门之《诗》三百不同于今存《毛诗》之证。惟自另一方面论之,《左传》引诗二百七十七条,其间作者自引及述孔子之言者四十有八,而逸诗

不过二条；列国公卿引诗百有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三条。（此魏源所统计，见《诗古微》一《夫子正乐论》中。）此外《孟子》、《荀子》及《礼记》诸篇，所引逸诗亦鲜。故可谓今存之《毛诗》，与孔子所见之本，虽稍有差异，而大体相同，则据今《毛诗》三百篇以研究古三百篇如何纂辑，或不致大误也。（朱彝尊《经义考》论诗所以逸之故，一则秦火之后，竹帛无存，而口诵者偶遗忘也；一则作者章句长短不齐，而后之为章句之学者，必比而齐之，于句之从出者去之故也。）

孔子之时，已有《诗》三百篇，则《诗》三百篇之纂为定本，必前于孔子。然则当在何时乎？按《陈风·株林》咏陈灵公事，为三百篇中最晚之诗。陈灵公被弑在鲁宣公十年（公元前599年），下至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时，（公元前552年。按此据《公羊》、《穀梁》本《春秋》经。《史记》载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则当为公元前551年。）凡四十七年，再下推至孔子十五志学之时，约六十年。孔子十五志学之时，或已得读《诗》三百篇，则《诗》三百篇之纂定，必在此六十年之内，即最早不得前于鲁宣公十年，最迟不得晚于襄公末年也（襄公在位三十一年）。《左传》记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在鲁观乐，鲁为之歌《周南》、《召南》及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郕诸国风，与今本《毛诗》次第微异，而国名全同，或其时《诗》三百篇已有定本乎？（《邶风·燕燕》，三家诗说谓卫定姜送其妇或娣之作，约当卫献公初立之时〔《列女传》、《坊记》郑注、王氏《诗考》。〕按卫献公元年为鲁成公十五年，则《燕燕》诗当作于鲁成公之时，又在《株林》之后矣。惟《燕燕》诗就本文观之，仅可知其为送别之诗，无从断其作者为庄姜，或定姜，或其他卫君、卫夫人。三家说亦无确证，故不取，而仍以《株林》为《诗》三百篇中最晚之作。）

《诗》三百篇之纂为定本，虽在鲁宣公之后，然宣公以前，王朝亦

必时时颁诗于诸国，诸国士大夫皆讽诵之，或宴享咏歌，或语言称引，惟所诵者无三百篇之多耳。何以知之？曰：《诗》、《书》、礼、乐，为古代教育之具，而《诗》之用尤广，故两周士大夫无不渐渍于诗教。西周时，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已引《周颂·时迈》，芮良夫谏厉王，亦引《周颂·思文》及《大雅·文王》（《周语》上），可见在西周时，《雅》、《颂》已为人所传诵。当春秋前叶，隐、桓、庄、闵、僖五公之时，三百篇中诸诗，有尚未作者；（如秦人赋《黄鸟》，《左传》记于文公六年，《陈风·株林》作于鲁宣公时，皆在僖公之后。）有虽作而未必即经王朝纂录颁布者；（如许穆夫人赋《载驰》，郑人赋《清人》，《左传》均记于闵公二年，及经王朝纂录颁布，至早亦应在僖公末年。《鲁颂》乃颂僖公之作，亦未必当时即蒙王朝纂录颁布。《毛序》谓《驹》乃史克所作，则又在僖公之后矣。）而《左传》所记此五公时，列国君卿大夫言语引诗、宴享赋诗者，凡十五条，（《左传》闵公二年记许穆夫人赋《载驰》及郑人赋《清人》，乃记作诗之事，至于“君子曰”以下所引诗，乃《左传》作者之词，均不在此列。）《国语》中记东周人士赋诗引诗在鲁僖公以前者，凡十四条。合两书所记，赋诗之人有楚成王、秦穆公、晋文公、周富辰、郑太子忽、叔詹、陈公子完、齐管仲、晋士蒯、韩简、臼季（即胥臣）、秦公孙枝、宋子鱼、公孙固、鲁臧文仲、齐姜氏等，可见此时各国君卿大夫皆已诵诗。此可为王朝时时颁诗于诸国之证。隐、桓、庄、闵、僖五公时，各国君卿大夫引诗赋诗，就《左传》所记之十五条考之，引《国风》者仅僖公三十三年晋臼季引邶诗“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一条，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引诗“翘翘车乘”云云，乃逸诗，不知其应属《雅》，或属《风》，此外皆为《雅》、《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赋《河水》，杜注：《河水》，逸诗。而据《国语》韦昭注，《河水》当作《沔水》，亦《小雅》也。）就《国语》所记之十四条考之，引《国风》者，仅齐姜氏引郑诗“仲可怀

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及楚成王引曹诗“彼己之子,不遂其媾”两条(《晋语》),其余亦皆《雅》、《颂》。由此可见,在春秋前叶,《国风》中诸诗或尚未作,或虽作而尚未经王朝纂录颁布,故传诵于士大夫之口者尚少也。(文、宣、成、襄、昭诸公之世,士大夫引诗赋诗,虽仍以大小《雅》为多,然邶鄘卫、郑、唐诸国风诗,均见征引赋咏,与僖公以前情形不同。)

《诗》三百篇,《周颂》为王朝颂功德祀神明之歌,大小《雅》除宴享之乐歌外,多王朝士大夫感时讽政之作,献之于天子者,此诸诗自当掌于王朝大师之官。至于诸国《风》诗,如何收集,旧说皆谓由于采诗之制。然采诗制之实况,果如何乎?古书中记采诗制最详者,为班固《汉书》及《公羊传》何休注,而班、何两家之说,即相参差。《汉书·食货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艺文志》亦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两家说不同之点,即班书所言,似行人乃王官,直至各国采诗,归而献之大师,而何休所说,则采诗并无专官,由各国自采集之,以闻于天子。二说孰为近真,固难臆断。如进而研究之,古书言采诗之官者,除《汉书》外,如刘歆所谓“道人”(《与扬雄书》),扬雄所谓“辘轩之使”(《答刘歆书》),许慎所谓“迈人”(《说文》第五篇上),皆汉人之说。先秦诸书,未有明言采诗之官者。《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夏书》曰:“道人以木铎徇于路。”杜注:“道人,

行人之官也。徇于路，求歌谣之言。”据此，则遘人或行人，即古采诗之官。惟细绎之，师旷引《夏书》只言“遘人以木铎徇于路”，未言采诗，而“求歌谣之言”一语，乃杜注所增。《周礼》虽六国时书，然亦多据成制，非尽虚构，其中无遘人之官，而记大小行人之职，亦无采诗一事。《周礼》作者，熟于掌故，杂采以前官制而增益弥缝之，不厌详密，以寄其理想。苟王朝有采诗之官，作《周礼》者谅不致删弃。至于“以木铎徇于路”之制，《周礼》中有之，如乡师“以木铎徇于市朝”，乃所以警戒人民，发布政令。木铎警众，盖为古制。然则师旷引《夏书》所谓“遘人以木铎徇于路”，殆亦警戒人民，宣布政令，与采诗无涉。（师旷引《夏书》之语，伪古文《尚书·胤征》篇袭取之。伪孔注曰：“遘人，宣令之官。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其义似较杜氏为长。又按《论语·八佾》篇，仪封人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亦谓天将使孔子明道施教，以化天下，非谓使孔子采诗也。）且古者天子与诸侯之关系，非若后世朝廷之与郡县，刑政教令，未能直达，况采诗小事，何劳王官遍游各国，巡行乡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凡王官至鲁，如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隐公元年），武氏子来求赙（隐公三年），凡伯来聘（隐公七年），南季来聘（隐公九年），宰渠伯纠来聘（桓公四年），仍叔之子来聘（桓公五年），家父来聘（桓公八年），祭公来（桓公八年），家父来求车（桓公十五年）等，均书于《春秋》经，独无王朝采诗之官来鲁之事。故吾疑班书说古代采诗制之隆重，不免稍有理想化之嫌。何休所言，或近真欤？

前人亦有怀疑采诗制者，故魏源有霸者陈诗之说，其言曰：“问郑自子产执政以后，褚其衣冠，伍其田畴，诲其子弟，风俗大变，而始谤终颂之谣不登于诗者何？曰：诸国之风，皆陈于齐桓、晋文，而桓、文以后，惟秦康公诸诗陈于晋襄，陈灵诸诗陈于楚庄，此外无闻焉。